當人們開始鬆懈之後

文／ 莊玉珍（鏡新聞新聞部資深副總監）

2025年9月22日，氣象預報又一個颱風接近台灣——強颱樺加沙以每小時20公里左右的速度，向西北西前進，從台灣南方海面經過，預計從22日晚上到23日上午最接近台灣，但它不會登陸台灣陸地，甚至連暴風圈也不會碰到台灣。

對正在新聞部值班記者們——包括我，確認完了颱風警報內容後的第一反應都是，這算是個好消息。因為這回的颱風，至少、應該會平安度過。心裡一邊這麼想，一邊關注颱風動態；果然到了23日中午，午間新聞收播，雨勢沒有再加大。花蓮地區儘管收到堰塞湖可能溢流的訊息，但至中午截稿為止，馬太鞍溪的水位只是正常上漲，不算是太危險的狀態，颱風警報眼看已經解除，不需要加班延棚，也不用再關注風災報導。

想不到的是，9月23日下午接近三點左右，突然接到了駐地記者的回報。

「堰塞湖溢流出現。大量洪水往下游灌……」

「馬太鞍溪橋衝斷了！橋都沒了！」

「光復超級嚴重哦！」

然後就是一段又一段，大洪水衝入光復鄉，大量泥水淹沒了車輛、房子，來不及逃的民眾在水中載浮載沉的掙扎畫面，不停地出現……。

災難的發生，不僅僅只是災難本身

災難總是在人們開始鬆懈下來的時候，猛然來襲。回顧過去三十年的新聞工作歷程，參與過多場重大災難的第一線採訪，很多災難場面的出現，不僅僅是現在大家最愛說的「極端天氣造成不可避免的災害」、「地震損害的發生無法避免、難以控制」；每一次站在災難現場，我總是會想：天災不是人力可控，但做好預防、教育民眾的防災意識，卻是平常就應該要做到的事情。這些事前的準備，可以讓天災來臨時，盡量減少受害程度。

作為一個記者，不管原本被分派到主跑什麼路線，當颱風、地震以及突發事故發生時，都會有被派往第一現場的時候。有幾件歷史性災難，讓我至今都難以忘懷：首先是在我還是個菜巴巴小記者的時候，1988年2月16日晚上，八點零五分發生的大園空難。這一天，我正負責小夜值班，辦公室外面下著細雨，突然有突發訊息傳進了新聞部：有一架飛機摔了！我必須立刻趕往發生墜機事故的大園現場。

一架華航從峇里島返台的班機，因重飛操作失誤，失速墜毀，造成機上196人加上被波及的地面民宅，共202人罹難；乘客名單包括時任央行總裁的許遠東。我跟攝影記者接到任務立刻衝往墜機現場，因為下雨加上救難人員拉水線灌救，地上都是積水、爛泥；而眼前的場景，是一堆又一堆的殘骸，四處散落的物品，幾乎看不出飛機原本的樣子。天亮後，我跟攝影找了空檔去洗洗手、洗洗腳上的泥土，突然發現，我們踩了一整的泥水，竟然混雜著血水。那是一種超越鏡頭畫面、直擊內心的衝擊；我第一次體會到「災難現場」的重量——原來新聞工作不只是報導數字與畫面，更要直面這些生死一瞬的殘酷。

1999年9月21日，只要經歷過的台灣人，大概很少有人會忘記。凌晨時間，強烈地震搖醒了全台灣民眾，那時我住在淡水，16樓，不只被搖醒，還狠狠被驚嚇到。瞬間的斷電斷訊斷話，讓我只能迷迷糊糊走16層樓梯下到社區一樓大廳，然後在門口發呆。一陣子後才突然想起來，搖這麼嚴重，該不會災情很嚴重吧？於是我開車趕往公司。走進辦公室時，已經有住得近的同事先到了。有人在確認震央是埔里後，叫上SNG車就直接往南投去；也有人收到台北市區竟然有大樓傾倒的消息，背上攝影機就衝向現場。我則是被臨時派上主播台，開始不間斷播報各個現場傳回來的消息。

九二一地震的「災難現場」，幾乎是無處不在的。但當時通訊全斷，也沒有如現在這麼便利的網路，只能靠衛星訊號、無線電傳送訊息，資訊極度缺乏；就算是每天接收各種消息的「記者」，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詳細的災情究竟到達什麼程度，更別說一般民眾可

能更是什麼也問不到、聯絡不上家人朋友；甚至是已經受災、被困在某處的人，可以想像他們是如何地恐慌。新聞工作者們一邊拚命地找各種方法，把畫面、災情傳送出來，因為這樣的時刻，其實更需要新聞傳播的力量來穩定慌亂又無助的情緒。比如，告訴民眾如何正確前往避難處，甚或是救難人員挺進災區的進度，這些都能讓受災的人保持最大的希望，也讓著急尋找親友的人能有最基本的訊息，好冷靜下來。新聞不只是「報導現場多慘」，更肩負著「傳遞訊息、安撫人心」的重要職責，同時，如何確保資訊的真實與準確、如何避免謠言擴大，也是新聞工作者在災難時刻的首要考驗。

還有高雄氣爆，那正發生在我回到家鄉高雄，在南部新聞中心擔任主管職的時候。2014年7月31日，深夜突然接到值班記者的電話——這種時候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好消息。果然，記者回報發生了氣爆事件，而且不是普通的氣爆，而是好幾條主要幹道發生連環氣爆，從凱旋三路、二聖路到三多一路，爆炸把柏油路面整個掀翻！過去只會在外電報導的戰地新聞中才會出現的畫面，就在這一夜，突然出現在熱鬧的高雄市區，一大片爆炸後的區域就宛如遭受空襲過後的廢墟，震撼程度難以言喻。

南部新聞中心的人員全都出動，在台北的總部也接到回報，連夜開始調度人力出發趕來支援；不只是一家電視台，而是全台灣的新聞台都啟動全面作戰模式。在震憾過後，大家開始問：怎麼可能發生這麼離譜的氣爆？要多少的瓦斯才會同持炸掉幾條街？原來早在當天晚間八點左右，發生爆炸的前鎮區就一直傳出瓦斯外洩消息，不停有居民反應聞到很濃的瓦斯味，消防隊也測到超標的丙

烯濃度，但卻找不到洩氣點，因此誤判情勢，也沒有封鎖現場進行疏散。最終在四個小時之後，導致了這場台灣前所未有的大爆炸事故，造成32人死亡，超過三百人受傷。

災難的發生，往往不只是災難本身；在背後有多少被掩蓋的真相，一直是新聞工作者在採訪災難新聞的同時，會去思考、也必須思考的問題。比如花蓮光復鄉洪水造成的傷亡數字，其實是因為沒有做好疏散安置；又比如地震造成的大樓倒塌事件，已經有很多案例告訴我們，是源自於建築時的偷工減料。

災難報導的意義，先是「透過鏡頭傳遞真實」。包括災難當下，災民需要協助、親友需要消息、政府需要掌握狀況，記者的鏡頭與文字往往是連結這些需求的橋梁之一。而許多所謂「天災」，其實源自於「人禍」；若不是記者追查內幕、揭露問題、形成輿論，社會的檢討與改革也可能受到阻礙。

在災難過去後，新聞工作者如何去找到問題真相，是更需要堅持的事。

記者的核心能力 吃苦當吃補。解決問題的能力

許多年輕人把新聞記者——尤其是電視新聞記者——視為一個光鮮亮麗的職業。化了電視妝、穿著套裝，站在鏡頭前連線報導，或在攝影棚內播報當天大事；成為一個主播也應該是很多人進入新聞圈的動力與目標。但其實，電視新聞記者是一個跟時間賽跑的苦力工作。被截稿時間、繁雜的剪輯作業流程、ON AIR播出壓力不

停催促，都只是電視新聞記者的日常中的基本而已。

災難新聞採訪尤其辛苦。現場永遠充滿變數：交通中斷、沒東西吃，找不到地方住、通訊不穩定、情況混亂。電視新聞記者首先要能吃苦，要有無比的毅力，堅持挺進現場——因為不會有任何畫面自動出現在你的攝影機裡。其次，面對無法預測、隨時都會出現的變數，衝現場第一線的記者，也要具備很好的判斷力、應變能力，自行找出解決方案，否則不管後勤單位再怎麼支援，也很難讓前線的採訪有效運作。

即使一切順利，抵達了第一線，還得有很好的觀察力、感受力，才能掌握現場情況，進行採訪工作。

而新聞台面對突發的災難新聞，則是從平常就不斷演練，做足備案。比如，一有颱風警報時，就會依登陸路徑，預先部署北中南記者如何調遣安排；地震一發生，則立即啟動早早就備好的「應變名單」：誰最擅長現場連線報、誰很會蒐集各種資訊，甚至是誰住得最近、能最快行動，都會在這份時時檢視更新的名單中，遇到狀況就能按本操練，即時組建起緊密的應變網絡。

災難的發生，總是難以預測，但事前準備，絕對可以早早就動起來。新聞記者們看災難新聞的採訪工作，也是如此。